胡振，罗浩文．社会资本影响农户正规借贷可获性吗？——来自3省4县农户微观证据［J］．山西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2，21（3）：1-9.
HU Zhen，LUO Haowen. Does social capital affected the availability of farmers′ formal loaning？——Micro evidence from farm household surveys in 4 counties in 3 provinces［J］. Journal of Shanxi Agricultural University（Social Science Edition），2022，21（3）：1-9.
DOI：10.13842/j.cnki.issn1671-816X.2022.03.001

社会资本影响农户正规借贷可获性吗？

——来自3省（区）4县农户微观证据

胡振，罗浩文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 经济管理学院，陕西 杨凌 712100）

摘 要：基于2017年陕西、河南、宁夏三省（区）2063个农户样本，采用离散选择模型分析了社会资本对农户正规借贷可获性的影响。研究发现：社会资本与农户正规借贷可获性存在正相关关系；社会资本对农户正规借贷可获性具有显著提升作用；亲朋数量、礼金数量、每月用于联络亲朋好友的电话费、亲戚朋友在政府部门任职都显著提高了农户正规借贷可获性；社会资本对中等收入样本具有明显提升效应；开展产权抵押贷款试点对社会资本具有一定的替代效应。因此，政府应重视社会资本缓解农户融资困难的作用，向农户宣传社会资本的重要性，帮助社会资本匮乏的农户建立一定的社会网络，并完善农村征信体系的建设，加快产权抵押贷款政策的推广。

关键词：社会资本；农村金融；农户正规借贷
中图分类号：F832.4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816X（2022）03-0001-09

一、问题的提出

2022年中央一号文件指出，民族要复兴，乡村必振兴。要坚持把解决好“三农”问题作为全党工作重中之重，把全面推进乡村振兴作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一项重大任务。当前我国已取得脱贫攻坚战的重大胜利，但巩固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建立解决相对贫困长效机制任重道远。已有研究表明，农村金融的发展对贫困率的降低有显著影响[1-2]，但长期以来农村地区普遍存在着金融约束，突出表现在农村经济主体的“融资难、融资贵、融资久”。李似鸿从农村金融的需求和供给两个角度分析得出：农户金融需求越来越大，但由于缺乏要素资料和抵押物，使农户的融资需求难以满足；农村资金大量外流、金融机构少、金融机构和服务未能深入农村经济和社会导致了农村金融供给的不足[3]。并且农村农贷市场的“精英俘获”现象导致农贷政策目标偏离，农贷资金不能公平传递[4]。金融机构倾向于长期向少数生产规模较大、具有稳定收入和身份特征的农户放贷，而不具备这些特征的农户将会面临信贷配给[5]。褚保金研究发现农户受到的信贷配给大多来自于正规金融机构，并且由于农户无法获得或不能完全获得投资所需的资金，从而影响了农户收入的增加[6]。在当前我国传统农业向现代农业转型的过程中，正规借贷对农户生产和经营具有重要作用，有利于提高农户收入，防止农户返贫，并且农户正规借贷能显著提升深度贫困地区农户脱贫质量[7]。因此，如何提高农户正规借贷可获性成为巩固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阶段亟待解决的重要问题。

根据已有研究，影响农户正规借贷可获性的主要因素大致可以分为以下几类。一是人口社会学基本特征变量，包括年龄、受教育程度、劳动

收稿日期：2021-11-20 **修回日期：**2022-03-03
基金项目：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基金项目（18YJC790053）；陕西省教育厅重点科研计划项目（21JT044）；陕西省科学技术协会提升公众科学素质计划项目（2021PSL102）；基本科研业务费人文社科重点培育项目（2452019156）
作者简介：胡振，研究方向：农村金融，消费金融，家庭金融。

力数。二是家庭资产状况，如家庭房产、耐用消费品、生产性固定资产。三是家庭收支，家庭年收入、教育支出、医疗支出、生产支出等。然而，也有文献证实，除上述因素外，个体的社会资本对农户借贷行为具有重要影响。社会资本是人际交往中自然形成的社会关系网络，比如亲戚朋友数量、政治身份等。

社会资本如何影响个体融资行为？主要通过两个途径：一方面，由于社会资本具有类似抵押物的功能[8]，能够对违约者实施一定的社会制裁，使违约者的声誉遭受损失，进而降低违约的可能性[9]；另一方面，信息不对称是正规金融机构与有借贷需求农户之间的一道“鸿沟”，社会资本有利于信息的传递，为双方提供更多的“软信息”，在双方之间搭起信任桥梁，缓解了信息不对称问题，降低了农户还款的监督成本，提高了正规金融机构对农户的授信概率。

国内学者大多关注社会资本对农户总体借贷可获性的影响，而从多维度衡量社会资本对农户正规借贷可获性的的文献较少。本研究利用2017年陕西、河南、宁夏三省（区）实地调研数据，对农户拥有的社会资本进行细化，采用离散选择模型分析社会资本对农户正规借贷可获性的影响。

本研究的创新之处主要表现在：1. 通过不同的维度构建社会资本指数，全面衡量社会资本。2. 以是否开展产权抵押贷款试点作为区域划分标准进行了异质性分析，得出在开展产权抵押贷款试点地区社会资本对正规的借贷可获性的影响减弱。3. 增加了环境政策变量：是否开展产权抵押贷款试点，对本研究的结论进行了稳健性检验，并发现开展产权抵押贷款试点对正规借贷可获性有显著的正向影响。

本研究剩余部分安排如下：第二部分对相关文献进行梳理并提出研究假说。第三部分介绍本研究使用的数据来源、设定的模型和相关变量，并对相关变量进行描述性统计分析。第四部分是实证分析，先对社会资本与正规借贷可获性进行统计学意义上的相关分析，然后进行回归分析，并对研究结论进行稳健性检验，同时探讨了社会资本对农户正规借贷可获性影响的异质性，最后一部分是研究结论及政策启示。

二、文献梳理及研究假说

社会资本是从私人投资活动过程中逐渐演变而来的网络、规范和社会信任[10]。

学术界对社会资本的常用代理变量主要有：请客送礼费，是否使用网络增加工资，有没有参加工会[11]，赠与亲朋的礼金数[12-14]，找工作动用的关系，聚餐频率及消费，是否送礼及金额[15]，春节期间来访的亲戚和朋友的数量[16]，家庭是否有家谱以及家庭所在村居祠堂的数量等[17]。而学术界也用不同的社会资本代理变量分析了对正规借贷可获性的影响。王修华等研究得出是否有亲戚担任干部、对金融机构很信任、对政府的信任度显著降低了农户受到来自金融机构的信贷排斥[18]。张三峰等从农村信用体系建设角度研究发现农户信用评级不仅使农户倾向于向正规金融机构贷款，而且增加了农户正规借贷可获性，在整体上缓解了农户受到的正规金融约束[19]。林建浩研究得出社会网络中的朋友圈网络在正规渠道中起主导作用，但只影响正规借贷的可获性，而不影响具体的借贷额度[17]。范香梅认为将社会资本引入贷款合约，将有助于解决农村融资难问题[20]。已有研究发现社会资本对农户正规借贷可获性有显著正向影响[16, 21]。正规金融机构与农户之间存在着信息不对称问题，正规金融机构需要对农户的信息进行收集并且对农户的行为进行监督，而社会资本作为一种规范和社会信任，对农户的行为具有一定约束作用，提高了违约成本，减少了农户的道德风险，所以它可以作为一种无形抵押物，从而降低了农户向正规金融机构借贷的门槛。因此，本研究提出假说1：

H1：社会资本对农户正规借贷可获性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

随着中国农村经济的发展，农户收入水平显著提升。Grootaert采用分位数回归研究发现低收入农户社会资本的回报率高于高收入农户社会资本的回报率，所以他认为社会资本是穷人的资本[22]。而周晔馨从多维度构建社会资本指数分析得出：低收入农户社会资本的拥有量和回报率低于高收入农户[23]。杨明婉和张乐柱认为拥有社会资本多且收入水平较高的农户，更容易获得正规金融机构的贷款。原因在于高收入的农户本身拥有较为优质的社会资本，并通过较多的人情支出

等对社会资本进行维护，从而更容易获得正规金融机构的借贷[24]。为了探究社会资本对不同收入水平农户借贷可获性的影响，本研究通过对不同收入水平的样本进行分析，在一定程度上揭示不同收入水平下社会资本对农户正规借贷可获性的影响的差异性。因此，本研究提出假说2：

H2：不同收入水平下，社会资本对正规借贷可获性的影响程度不同。

三、数据来源、模型设定和相关变量

（一）数据来源

本研究所使用的数据来源于课题组2017年在陕西、河南、宁夏三省（区）的农户实地调查，调查问卷内容主要包括户主特征、家庭特征、家庭关系网络、社会资本、农村普惠金融情况五部分。调查采用分层抽样方法，陕西省选取户县和宜君县，河南省选取固始县，宁夏回族自治区选取平罗县。户县是全国小额信贷公司试点县，宜君县是国家扶贫开发工作重点县，固始县和平罗县为农村产权抵押贷款试点县。从每个县随机抽取部分乡镇，再从每个乡镇随机抽取1～2个村进行，共抽取40个乡镇和87个村。调查的方式为问卷调查，收集了包括宜君县390户，户县2500户，固始县251户，平罗县389户，共调查了3530户农户，剔除信息缺失等无效问卷后，最终获得有效问卷2063份。

（二）模型设定

本研究使用Probit模型分析社会资本对农户正规借贷可获性的影响，被解释变量为农户是否获得贷款，获得贷款赋值为1，反之为0。由于被解释变量为离散型变量，普通的OLS回归会产生较大偏差，降低有效性。因此，有必要使用特殊的模型来处理此类数据，即Probit模型。具体回归方程设定如公式：

$$\text{lend}=\alpha+\beta_1 SC_i+\beta_2 X_i+\varepsilon_i \quad \varepsilon\sim N(0,1) \tag{1}$$

当$\text{lend}^*>0$时，农户获得贷款，当$\text{lend}^*\leqslant 0$时，农户未获得贷款，假定ε是独立于X，且服从于标准正态分布。

那么影响农户是否获得借贷的二元离散选择模型如下：

$$\text{Prob}(\text{lend}=1|X=x)=\text{Prob}(\text{lend}^*>0|X) \tag{2}$$

其中φ是标准正态累积分布函数，lend表示是否获得正规借贷，SC表示社会资本；X_i表示控制变量，包括性别、年龄、是否为户主、受教育程度等；ε_i表示随机扰动项，α表示回归常数项；β_1和β_2分别表示待估参数，比如β_1即为在控制相关变量不变时，社会资本对农户正规借贷可获性的影响。

（三）相关变量

1. 被解释变量

本研究以已申请正规借贷的农户是否获得贷款为被解释变量，被解释变量记为lend。获得赋值为1，未获得则赋值为0。

2. 核心解释变量

核心解释变量是社会资本。具体通过构造社会资本指数度量，选取亲朋数、街坊数、每月用于联络亲朋好友的电话费、礼金数、是否有亲戚朋友担任（过）村干部、是否有亲戚朋友在政府部门任职（过）、是否有亲戚朋友在银行或信用社工作（过）共七个变量，利用变异系数法构建的社会资本指数用index表示，均值为0.078，处理方式如下：

首先，对原始变量进行标准化处理：

$$X_{ij}=[u_{ij}-\min(u_{ij}-\min(u_{ij}))]/[\max(u_{ij})-\min(u_{ij})] \tag{3}$$

其中，u_{ij}表示社会资本中第i个指标对应于第j个农户原始数据，x_{ij}表示第i个指标对应于第j个农户的标准化数据。

第二，计算变异系数（V_i）。计算7个指标的均值与标准差，分别用$\bar{s}_i$和$\bar{x}_i$表示。变异系数为：

$$V_i=\bar{S}_i/\bar{X}_i \tag{4}$$

第三，变异系数归一化处理。分别计算社会资本中各个指标的权重（W_i）。$=(W_1, W_2, W_3, W_4, W_5, W_6, W_7)$，其中：

$$W_i=V_i/\sum_{i=1}^{6}V_i \tag{5}$$

最后，计算社会资本指数

$$\text{index}=\sum u_{ij}\times W_i \tag{6}$$

3. 控制变量

基于相关文献，本研究的控制变量见表1。从表1中可以看出，在年龄方面，受访者的平均年龄分布在40岁到49岁之间；在性别方面，64.6%的受访者为男性；在受教育程度方面，平均受教育程度为初中教育，大部分受访者未接受过高等教育；在劳动力数方面，受访农户的家庭平均劳动力数约为3个；在家庭年收入方面，家庭平均年收入为84 140元。

表1 变量描述统计结果

变量	变量含义	观测值	均值	标准差	最小值	最大值
lend	若申请过贷款，是否获批贷款，是=1，否=0	2063	0.246	0.431	0	1
index	社会资本指数	2063	0.078	0.137	0	0.705
relatives	亲戚朋友的数量	2063	6.496	5.214	0	60
neighbor	街坊邻居的数量	2063	13.54	17.858	0	300
lntel	每月用于联络亲朋好友的电话费，取对数	2063	7.665	1.043	1.099	11.29
lncas	礼金数，取对数	2063	4.147	0.811	1.609	7.601
village	是否有亲戚朋友担任（过）村干部，是=1，否=0	2063	0.168	0.374	0	1
government	是否有亲戚朋友在政府部门任职（过），是=1，否=0	2063	0 .08	0.271	0	1
bank	是否有亲戚朋友在银行或信用社工作（过），是=1，否=0	2063	0.084	0.277	0	1
mortage	您是否参加农村产权抵押贷款，是=1，否=0	2063	0.193	0.395	0	1
householder	是否为户主，是=1，否=0	2063	0.612	0.487	0	1
gender	性别，男=1，女=0	2063	0.646	0.478	0	1
age	年龄1~5段	2063	3.428	1.219	1	5
education	受教育程度，文盲=1，小学文化=2，初中文化=3，高中文化=4，大专及以上=5	2063	2.856	1.001	0	5
population	家庭人口数	2063	4.683	1.605	0	32
labor	家庭劳动力数	2063	2.94	1.166	0	8
income	家庭总收入（万元）	2063	8.414	13.797	0.07	300
saving	家庭储蓄1~5档	2063	1.095	0.571	1	5

注：依据实地调研数据整理所得

三、社会资本对农户正规借贷可获性的实证分析

（一）社会资本与农户正规借贷可获性相关性分析

首先分析社会资本与农户正规借贷可获性的相关性，结果见图1。横轴为社会资本指数，参考程丽香[25]的做法，本研究将社会资本按从小到大的顺序，每20%的样本作为一个社会资本类别，这样将社会资本总共分成5类，然后统计不同社会资本水平下农户的正规借贷可获性，如图1折线图所示。整体上可以非常直观的得出，随着社会资本的提高，样本农户的正规借贷可获性也在提高，社会资本与农户正规借贷可获性呈正相关关系。此外，进一步统计了不同社会资本水平下的样本分布情况，从图1柱状图可以明显看出，社会资本较低的农户占样本的大多数，也就是样本农户社会资本较低。

（二）社会资本对正规借贷可得性的影响：基准回归

图1是社会资本与农户正规借贷可获性的相关关系分析，只能得出两者的正相关关系，接下来采用Probit模型进行回归分析，进一步考察社会资本对农户正规借贷可获性影响的大小，结果见表2。

逐步加入控制变量后，从模型1到模型5可以看出社会资本的回归系数显著为正，说明社会资本的增加可以显著提高农户正规借贷可获性。本研究认为，从农户角度来说，社会资本增加了农户获取正规金融机构信息的渠道，改善了与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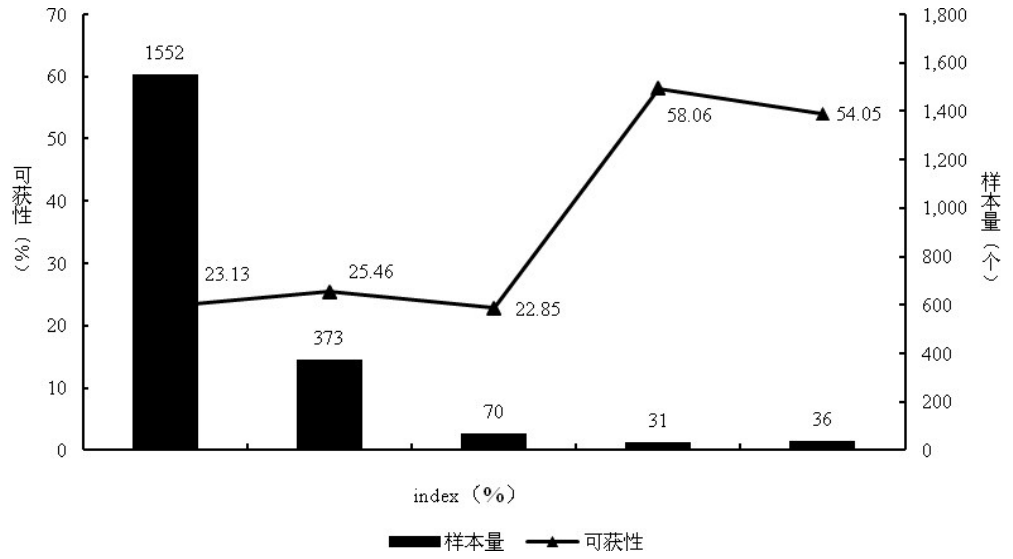


图1 社会资本与正规借贷可获性的相关性

表2 社会资本对农户正规借贷可获性的影响

变量	模型1	模型2	模型3	模型4	模型5
index	0.250***	0.242***	0.249***	0.158**	0.175***
	(0.064)	(0.063)	(0.063)	(0.064)	(0.063)
householder	0.176***	0.155***	0.152***	0.134***	0.122***
	(0.027)	(0.027)	(0.027)	(0.026)	(0.026)
gender	0.058**	0.062**	0.060**	0.051*	0.043*
	(0.027)	(0.027)	(0.027)	(0.027)	(0.026)
age	−0.053***	−0.048***	−0.045***	−0.036***	−0.029***
	(0.009)	(0.008)	(0.009)	(0.008)	(0.008)
education	−0.012	−0.015	−0.013	−0.013	−0.009
	(0.010)	(0.010)	(0.010)	(0.010)	(0.010)
population		−0.043***	−0.031***	−0.031***	−0.027***
		(0.006)	(0.007)	(0.007)	(0.007)
labor			−0.029***	−0.035***	−0.032***
			(0.009)	(0.009)	(0.009)
income				0.007***	0.006***
				(0.001)	(0.001)
saving					0.121***
					(0.019)
样本量	2063	2063	2063	2063	2063

注：***、**、*、分别表示在1%、5%、10%的水平上显著，括号内的数字为标准差

规金融机构之间的信息不对称状况；从正规金融机构的角度来说，社会资本有分担风险、减少违约行为、降低信息获取成本的作用，有效地缓解了逆向选择和道德风险问题，所以正规金融机构更愿意为社会资本高的农户提供贷款。

除了核心解释变量之外，通过表2还可以看出，是否为户主、年收入、储蓄对农户正规借贷可获性均有显著正向影响。户主通常拥有家庭经济决策权，有利于正规借贷的获得；而家庭年收入高、储蓄多的农户具有较好的还款能力，所以更容易获得贷款。

综上所述，社会资本显著提高了农户正规借

贷可获性，这一结论验证了前文假说H1的预测。

（三）异质性分析：年收入和开展产权抵押贷款试点

为进一步分析社会资本对农户正规借贷可获性的影响，本研究根据农户的家庭年收入和当地是否开展产权抵押贷款试点将样本进行划分，进行了异质性分析。

首先分析不同年收入段下社会资本对农户正规借贷可获性的影响。具体做法是按照年收入将农户分为5组，年收入低于3万元的为低收入农户；年收入介于3万元到6万元的为中低收入农户；年收入介于6万元到9万元的为中等收入农户；年收入介于9万元到12万元的为中高收入农户；年收入大于12万元的为高收入农户。由表3可知在中等收入段社会资本对农户正规借贷可获性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而其他收入段的影响并不显著，且随收入的增长社会资本的边际效应先上升后下降。收入较低的农户因收入的缺乏，不能按时还清贷款的可能性较大，正规金融机构就不愿意向这部分农户放款，即使这部分农户增加了一定的社会资本，也不能对借贷的可获性产生显著的影响；而收入较高的农户本身经济状况较好，有足够的收入作为还款的保证，较易获得正规金融机构的贷款，所以社会资本对正规借贷可获性的影响较小。而对于中等收入群体的农户，处于正规金融机构考虑是否放款的临界点，社会资本就成了正规金融机构考察农户违约可能性的关键因素，那么此时的社会资本对于农户能否获得正规借贷具有重要的影响。

表3 不同年收入下社会资本对农户正规借贷可获性的影响

变量	低收入	中低收入	中等收入	中高收入	高收入
index	0.144	0.215	0.446***	0.167	−0.019
	(0.137)	(0.146)	(0.157)	(0.192)	(0.138)
控制变量	已控制	已控制	已控制	已控制	已控制
样本量	453	478	291	183	284

注：***、**、*、分别表示在1%、5%、10%的水平上显著，括号内的数字为标准差

综上所述，社会资本对中等收入段农户的正规借贷可获性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而对其他收入段农户的影响并不显著，这一结论验证了前文假说H2的预测。

接下来进一步分析开展产权抵押贷款试点下社会资本对农户正规借贷可获性的影响。宜君县和户县未开展产权抵押贷款试点，固始县和平罗县开展了产权抵押贷款试点。从表4可以发现，社会资本对农户正规借贷可获性都为正向影响，但显著性不同，对于固始县和平罗县的农户，社会资本在5%的水平上对正规借贷可获性有显著的影响，而对于宜君县和户县的农户，社会资本对正规借贷可获性的影响并不显著。这表明在开展了产权抵押贷款试点的地区，社会资本对农户正规借贷可获性的影响是不显著的，这与既有的结论是一致的[26]；而在未开展产权抵押贷款试点的地区，社会资本对农户获得正规借贷的影响是显著正向的。可能的原因是：在缺少政策性制度的农村金融环境下，社会资本作为一种隐形的抵押品，显著增加了农户获得正规借贷的可能性。而在开展了产权抵押贷款试点的情况下，相当于对农村地区增加了正式的金融供给，农户所拥有的农耕用的土地和宅基地均可作为一定的抵押品，即增加了农户的抵押品，故社会资本这种非正式制度作为替代抵押品对正规借贷的可获性的影响相应地减小。

表4 开展产权抵押政策试点下社会资本对农户正规借贷可获性的影响

变量	户县和宜君县	平罗县和固始县
index	0.127**	0.121
	(0.060)	(0.060)
控制变量	已控制	已控制
样本量	1，661	399

注：***、**、*、分别表示在1%、5%、10%的水平上显著，括号内数字为标准差

五、稳健性检验

为了验证上述实证结果的可靠性，本研究采用三种不同的做法进行稳健性检验。做法一为更换社会资本代理变量，做法二为剔除极端值样本，做法三为增加环境政策变量。具体如下：

稳健性检验做法一：考虑到社会资本指数是用不同的社会资本代理变量所构造的，那么用不同的社会资本代理变量来衡量社会资本所得到的结论应与假设1一致，于是分别用亲朋数、礼金数、电话费和是否有亲戚朋友担任（过）政府干

部作为社会资本代理变量进行回归，结果见表5。亲朋数在1%的水平上对农户正规借贷可获性有显著正向影响，原因在于，一方面，拥有的亲戚朋友越多，信用损失造成的违约成本越高，正规金融机构所承担的违约风险较小，所以更容易获得正规金融机构的授信；另一方面，亲戚朋友数量越多，农户获取金融信息来源广泛，从而更有利于获取正规借贷。礼金数在1%的水平上对农户正规借贷可获性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礼金支出代表农户为巩固社会网络做出的投资，礼金支出越多，说明农户社会网络关系越稳固，农户向亲友的借款渠道越多，偿债能力增强，这会进一步降低正规金融机构的授信风险，所以农户更容易获得正规金融机构的贷款。电话费用在5%的水平上对农户正规借贷可获性有正向的影响，电话费代表农户和亲戚朋友交流的频率，电话费用越高，代表农户与亲朋的交流越密切，社会网络关系越紧密，有利于获取更多的金融借贷信息，对授信条件更为清楚，从而获取借贷的可能性越大。有亲戚朋友在政府部门工作（过）对农户获得正规借贷在10%的水平上具有显著提升作用。首先，农户缺乏金融知识和参与金融事务的有效途径，在政府部门工作的亲戚朋友会主动向农户普及金融知识，介绍政府的优惠政策以及金融机构的贷款利率，增加了农户所得的信息，农户也可通过这层关系进行咨询和寻求帮助；其次，在政府工作（过）的亲戚朋友收入较为稳定并且社会地位较高，可以作为农户的担保人，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起到隐形的信用背书作用，减少了信息不对称和缺乏抵押担保等问题，从而增加了农户的正规借贷可获性。

稳健性检验做法二：考虑到社会资本对农户对正规借贷可获性的影响的结论可能存在偶然性，分别将农户家庭年收入位于前1%和后1%、前5%和后5%、前10%和后10%的样本剔除后进行回归，结果见表6的模型10、模型11和模型12。分别剔除样本后，相关估计结果与基准回归结果（表2）相比，社会资本对正规借贷可获性的系数和显著性水平并未发生较大变化，说明估计结果是稳健的。

稳健性检验做法三：考虑到土地是农户所拥有的固定资产，有土地承包权的农户可通过将土地承包权进行抵押获取融资，所以增加政策环境变量：是否开展产权抵押贷款试点，结果见表6的模型13。在增加了政策环境变量后，社会资本对农户正规借贷可获性的影响并未发生较大变化，说明估计结果是稳健的。与李韬、罗剑朝[27]的发现相同，开展产权抵押贷款试点对农户正规借贷的可获性具有非常显著的正向影响，这可能是因为开展产权抵押贷款增加了农户手中的抵押品，正规金融机构所承担的违约风险减小，所以更愿意发放贷款。

表5 社会资本对正规借贷可获性影响（稳健性检验）

变量	模型6	模型7	模型8	模型9
relatives	0.019***			
	(0.002)			
lncas		0.138***		
		(0.008)		
lntel			0.029**	
			(0.011)	
goverment				0.056*
				(0.031)
控制变量	已控制	已控制	已控制	已控制
样本量	2，063	2，063	2，063	2，063

注：***、**、*、分别表示在1%、5%、10%的水平上显著，括号内的数字为标准差

表6 社会资本与正规借贷可获性的影响（稳健性检验）

变量	模型10	模型11	模型12	模型13
index	0.275***	0.194***	0.240***	0.152***
	(0.051)	(−0.058)	(0.051)	(0.056)
mortgage				0.398***
				(0.019)
控制变量	已控制	已控制	已控制	已控制
样本量	2，017	1855	1650	2063

注：***、**、*、分别表示在1%、5%、10%的水平上显著，括号内的数字为标准差

六、研究结论与政策启示

本研究基于2017年在陕西、宁夏、河南三省（区）的农户实地调研数据，研究了社会资本对农户正规借贷可获性的影响。得出以下结论：

第一，整体上社会资本与农户正规借贷可获性正相关，社会资本有利于农户获得正规借贷，并且在社会资本代理变量中，亲戚朋友的数量、礼金数量、电话费支出规模、亲戚朋友在政府部

门任职对农户正规借贷可获性均有显著提升作用。第二，社会资本对中等收入农户正规借贷可获性具有显著促进作用，对其他收入段的农户正规借贷可获性的影响并不显著。第三，开展产权抵押贷款试点对农户正规借贷可获性有非常显著的正向影响。因为开展产权抵押贷款试点增加了对农村的正式的抵押供给，所以对于社会资本对农户正规借贷可获性的影响具有一定的替代作用。

根据以上研究结论，本研究得出以下政策启示：

第一，农户应充分重视社会资本对提升农户正规借贷可获性的作用。农户应重视社会资本的价值，有意识地扩大和巩固自身的社会网络。大部分农户将社会网络仅仅视作是社交来往中形成的一种“关系”，并没有注意到社会网络对于借贷和提升自身收入的重要作用。农户应认识到社会网络对于正规借贷的促进作用，扩大和积累自身的社会网络，积极参与社交活动，多多走亲访友增强社会网络的强度。并且农户也应维护自己的社会网络，现在农村外出务工人口较多，回家的频率较低，不少打工的农户因为和当地亲朋的聚少离多而疏远了关系。外出务工的农户应抽出一定时间“常回家看看”，增加每年和亲朋的见面次数，巩固已有的社会网络关系。

第二，政府应充分重视社会资本对不同收入农户借贷可获性的影响，针对不同收入农户采取不同的帮扶措施。对于中等收入农户，政府应从多方面帮助那些缺乏社会资本的农户建立一定的社会网络，比如鼓励农户加入资金互助组织，鼓励农户和亲朋之间来往，增加农户社会资本，从而提升农户正规借贷可获性。对于低收入农户，社会资本对低收入农户正规借贷可获性的影响并不显著，低收入农户的正规借贷更难获得，难以提高自身收入。在当前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与乡村振兴有效衔接的大背景下，政府应从培训就业技能、增强兜底保障等方面对低收入农户进行帮扶，提高农户收入。

第三，虽然社会资本重要，但是正规金融机构在增加金融产品供给方面不容忽视。正规金融机构应重视对农村金融的服务，加强金融机构基础设施建设，推进产权抵押贷款政策在农村地区的开展，总结农村产权抵押贷款试点经验，积极开发新型金融产品，如“果农贷”，“农商贷”等新型金融产品。银行工作人员应对周边农村地区定期进行走访，了解农民生产经营情况，获取农户的信息，推动农户信用评价体系的建立，从多方面衡量农户的信用及还款能力，降低农村正规金融约束，从而促进农村经济的发展。

本研究的不足之处：数据只用了三个省（区）的调研数据，结论对于全国范围可能不具有普适性。

参 考 文 献

[1] Agnello L，Mallick S K，Sousa R M．Financial Reforms and Income Inequality[J]．NIPE Working Papers，2012，116（3）：583-587.

[2] Clarke George R. G.，Xu Lixin Colin，Zou Hengfu. Finance and Income Inequality：What Do the Data Tell Us?[J]. Southern Economic Journal，2006，72（3）：578-596.

[3] 李似鸿．金融需求、金融供给与乡村自治——基于贫困地区农户金融行为的考察与分析[J]．管理世界，2010（1）：74-87.

[4] 温涛，朱炯，王小华．中国农贷的“精英俘获”机制：贫困县与非贫困县的分层比较[J]．经济研究，2016，51（2）：111-125.

[5] 张龙耀，江春．中国农村金融市场中非价格信贷配给的理论和实证分析[J]．金融研究，2011（7）：98-113.

[6] 褚保金，卢亚娟，张龙耀．信贷配给下农户借贷的福利效果分析[J]．中国农村经济，2009（6）：51-61.

[7] 王汉杰，温涛，韩佳丽．深度贫困地区农户借贷能有效提升脱贫质量吗?[J]．中国农村经济，2020（8）：54-68.

[8] Biggart N W，Castanias R P．Collateralized Social Relations：The Social in Economic Calculation[J]．American Journal of Economics & Sociology，2001，60（2）：471-500.

[9] Karlan D，Morduch J．Access to Finance[J]．Handbook of Development Economics，2009，5(3)：627-654.

[10] Putnam R D，Leonardi D R．Making Democracy Work：Civic Traditions in Modern Italy[J]．Contemporary Sociology，1994，26（3）：306-308.

[11] 刘林平，张春泥．农民工工资：人力资本、社会资本、企业制度还是社会环境？——珠江三角洲农民工工资的决定模型[J]．社会学研究，2007（6）：114-137，244.

[12] 章元，陆铭．社会网络是否有助于提高农民工的工

资水平?[J]. 管理世界，2009（3）：45-54.
[13] 杨汝岱，陈斌开，朱诗娥. 基于社会网络视角的农户民间借贷需求行为研究[J]. 经济研究，2011，46（11）：116-129.
[14] 童馨乐，褚保金，杨向阳. 社会资本对农户借贷行为影响的实证研究——基于八省1003个农户的调查数据[J]. 金融研究，2011（12）：177-191.
[15] 叶静怡，周晔馨. 社会资本转换与农民工收入——来自北京农民工调查的证据[J]. 管理世界，2010（10）：34-46.
[16] 胡枫，陈玉宇. 社会网络与农户借贷行为——来自中国家庭动态跟踪调查(CFPS)的证据[J]. 金融研究，2012（12）：178-192.
[17] 林建浩，吴冰燕，李仲达. 家庭融资中的有效社会网络：朋友圈还是宗族?[J]. 金融研究，2016，(1)：130-144.
[18] 王修华，傅勇，贺小金，等. 中国农户受金融排斥状况研究——基于我国8省29县1547户农户的调研数据[J]. 金融研究，2013（7）：139-152.
[19] 张三峰，王非，贾恩. 信用评级对农户融资渠道选择意愿的影响——基于10省(区)农户信贷调查数据的分析[J]. 中国农村经济，2013（7）：72-84.
[20] 范香梅，张晓云. 社会资本影响农户贷款可得性的理论与实证分析[J]. 管理世界，2012（4）：177-178.
[21] 张珩，罗剑朝，罗添元，等. 社会资本、收入水平与农户借贷响应——来自苹果主产区784户农户的经验分析[J]. 经济与管理研究，2018，39（8）：82-94.
[22] Christiaan Grootaert. Social Capital, Household Welfare, and Poverty in Indonesia[M]. 1999.
[23] 周晔馨. 社会资本是穷人的资本吗？——基于中国农户收入的经验证据[J]. 管理世界，2012（7）：83-95.
[24] 杨明婉，张乐柱. 互联网金融参与如何影响农户正规借贷行为？——基于CHFS数据实证研究[J]. 云南财经大学学报，2021，37（2）：42-53.
[25] 程丽香. 东南沿海县域居民财产分布差距比较分析——基于福建省福清市和龙海市的调查[J]. 中国农村经济，2009（12）：56-66.
[26] 黄惠春. 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抵押贷款可得性分析——基于江苏试点地区的经验证据[J]. 中国农村经济，2014（3）：48-57.
[27] 李韬，罗剑朝. 农户土地承包经营权抵押贷款的行为响应——基于Poisson Hurdle模型的微观经验考察[J]. 管理世界，2015（7）：54-70.

Does social capital affected the availability of farmers´ formal loaning? ——Micro evidence from farm household surveys in 4 counties in 3 provinces

HU Zhen，LUO Haowen

（*School of Economics and Management*，*Northwest A&F University*，*Yangling* 712100，*China*）

Abstract：Based on a sample of 2063 farm households in Shaanxi, Henan, and Ningxia Provinces in 2017, a discrete choice model was used to analyze the effect of social capital on the availability of formal loaning. It was found that there is a positive correlation between social capital and farmers′ formal loaning accessibility with a significant enhancing effect; the number of relatives and friends, the amount of gift money, the monthly telephone fees for contacting friends and relatives, and relatives and friends working in government departments all significantly increase farmers′ formal loaning accessibility; social capital has a significant enhancing effect on the middle-income sample; carrying out the pilot project of property rights mortgage has a certain substitution effect on social capital. Therefore, the government should pay attention to the role of social capital in alleviating farmers′ financing difficulties, publicize the importance of social capital to farmers, help farmers with little social capital to establish certain social networks, improve the construction of the rural credit system, and accelerate the promotion of the property rights mortgage policy.

Keywords：Social capital；Rural finance；Farmers′ formal loaning

（编辑：程俐萍）